



1月6日，一位遇难者家属在现场祭奠逝去的亲人。

上海外滩踩踏后遗症—— 对遇难者救助还是赔偿？

与新年一起到来的，是36条生命的逝去。

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，以信息发布与安全机制为起点，反思、质疑和追问一直没有停止，并显示出“专业主义”。信息如何有效发布、传播，踩踏事故的发生和应急处理机制，踩踏事故现场如何自救与救援甚至媒体采访的伦理问题，均引发广泛的讨论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

幸福仅仅一步之遥

2014年最后一天，傍晚时分，20岁的牟滨彬背起背包，与要好的朋友乘火车从义乌赶往上海。

对牟滨彬而言，上海是他新生活开始的地方，在此跨年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。2014年上半年，放弃高考的牟滨彬走出重庆忠县拔山镇的大山，到上海谋生。

2015年1月6日下午，牟滨彬的伯母向齐鲁晚报记者回忆，侄子学习成绩并不差，之所以弃考，是因为贫穷。

曾在忠县水泥厂上班的牟父，2007年因精神疾病丧失劳动能力，提前退休。“当时每个月的退休金才600多元，现在涨到了1000多。”牟滨彬的伯母说，为了打消牟滨彬的顾虑，2013年春节，全家人商定，由牟滨彬的四叔承担他的大学学费，生活费则由大伯、姑姑等人承担。

牟滨彬最终拒绝了家族的援助，选择用自己的双手改善家庭经济条件。中国象棋，是开启新生活的钥匙。

牟滨彬的伯母介绍，牟滨彬自幼学下象棋，虽没经过专业培训，可棋艺很好。“第一次参加重庆市在忠县举办的象棋比赛，就拿到了300元奖金。”

此后，牟滨彬陆续参加了上海、重庆和广州等地的象棋比赛，并获得名次。因此，对放弃读书后的生计，牟滨彬并不担心。离开学校后，已在上海市定居的小姨帮牟滨彬在上海一家象棋社找到了一份工作——象棋培训班教师。

2014年6月，经同事介绍，牟滨彬又到义乌一家象棋培训班教学。牟滨彬的伯母说，到义乌后，牟滨彬的收入有了起色，“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挣了1万多。”

牟滨彬未来的希望，已露出了尖尖一角。“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”面对齐鲁晚报记者时，家人们还会忍不住想象，如果不是发生了踩踏，当牟滨彬回到上海，站在外滩与最好的朋友一起跨年时，心里会有多少喜悦和憧憬。

跨年的意义仿佛就在于此。

23岁的江西上饶小伙周孝洋，2014年大学毕业来到上海，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；21岁的马来西亚女孩陈蔚，希望在新的一年，到更远的地方旅行……

一个个怀抱梦想、试图透过灯光眺望幸福的年轻人，不断向外滩汇集。

误判？失职？

当天22点多，牟滨彬抵达了上海。在此之前，他把自己的行程通过微信告诉了小姨和在外滩附近工作的表哥海丰（音）。约一个小时后，牟滨彬走出地铁站，与前行的人群一起直奔外滩。此时，稍晚之后遇难的潘海琴和李娜等人，已被挤得无法转身。

22时27分，上海地铁发布消息：截至21时50分，上海地铁全网客流达963万人次，超历史全天最高客流14.4万人次。

来自上海警方的数据显示屏：当天20

点30分左右，外滩的人流量已接近2013年灯光秀时的规模，达到了30万。随后人流持续增加，远远超出预期。

幸存者赵葳葳曾回忆，他带着相机想拍江边夜景，但汇入人潮后，相机只能举在空中，放都放不下来，“人和人之间几乎没有一点缝隙。”

23时32分，上海警方微博提醒：“外滩已近饱和，建议择地前往跨年。”

“外滩当时的情况，真的只是接近饱和？”媒体人邓璟事后质疑。邓璟检索到复旦大学博士后朱春霞2004年发表的毕业论文，文中，朱春霞结合中外踩踏事故研究指出，当景点室内达到1m²/人、室外达到0.75m²/人，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

无论是事故现场的报道，还是网友提供的大量现场图片，都显示事发前跨年人群的拥挤程度，已远超上述标准。

彼时，身在陈毅广场陈毅雕像东南方向台阶处，牟滨彬、周孝洋等人先后被挤倒。跌倒的赵葳葳刚爬起来，就看到了四处散落的鞋子，纷纷倒地的人，以及涌来的哭喊声、救命声。他认出了被压在人堆最下面的潘海琴穿的黄色羽绒服，使劲去拉却拉不动。

23时55分，网名为“穿T恤的元谋人”、参加跨年活动的上海长征医院一名医生，和同事一起到达外滩。倒计时过后，她们顺着人群慢慢向北挪动。“原本一切都那么美好。”事后，“穿T恤的元谋人”在日记里写到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牟滨彬也被送往瑞金医院急诊室。海丰还在等待表弟回家，踩踏事件的突然出现令他更加焦虑。2015年1月1日凌晨近1点半左右，他终于拨通了表弟的电话，另一端的声音说，牟滨彬正在瑞金医院急诊室接受救治。

消息传回重庆老家，家族成员赶忙收拾行李，订好机票，马不停蹄直奔上海。牟滨彬没能等到他们的到来。根据家属记录的就医信息，2015年1月1日2时55分，牟滨彬抢救无效离世。

生前困苦，身后不幸

36个离去的生命，留下的是36个难以接受的家庭。正是因为遇难者的年轻，家属们心中的那份不舍才更为浓重。

踩踏事故遇难者“头七”祭日的阴冷天气中，家属们始终难以平静。

牟滨彬的离去，让他生前的种种细节再次涌上家人的心头。“这个孩子很听话。”牟滨彬的伯母向齐鲁晚报记者回忆说，牟父虽然患有精神疾病，但因为病发的间歇性以及及时治疗，2011年之前，家里一直瞒着牟滨彬。

翻着手机相册中牟滨彬的照片，伯母一度哽咽。照片中，牟滨彬肩扛着叔叔家年幼的妹妹，和弟弟们一起开心笑着。孝顺、懂事、有担当，牟滨彬的伯母说，牟滨彬是独子，1月5日晚，受不了打击再犯精神疾病的牟父吃饭时端着碗喃喃说道，“儿子，吃饭了。”

最疼爱牟滨彬的爷爷，在事发一周后仍被蒙在鼓里。“因为一直在水泥厂工作，他得了尘肺病。”牟滨彬的伯母说，他

们唯恐家族再遭受二次打击。

不幸的家庭总有相似的不幸。“他今年才23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都没娶个媳妇成家。”遇难者周孝洋的大伯周著战（音）说，周孝洋同样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，父亲在煤矿做挖煤的临时工，在深黑的矿坑里，一天24小时也见不到几次阳光。

“他父亲染上了尘肺病，没有劳动能力，母亲患有严重糖尿病，干不了力气活。”周著战称，家里唯一经济来源只剩下周孝洋姐姐的收入。

“他姐姐一直没找到好工作，将来结婚了，父母的养老怎么办？”周著战一脸担忧，周孝洋的不幸遇难抛出了这个现实问题。“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需求，我们只希望多年后周孝洋的父母养老能有个出路。”周著战称。

更现实迫切的事

1月6日、7日，上海警方在祭奠现场设下数百米隔离带，围出媒体区、祭奠区等不同区域。

1月6日11时许，一位遇难者家属，试图从媒体入口进入时被拦下。“我的孩子死了，你们还不让我进去？”不满情绪瞬间爆发，这位家属眼看就要给拦他的警察下跪。祭奠结束后，这位家属仍大声指责阻拦的警察。愤怒背后，既是家属对与事故相关的信息传播、安全机制的质疑，也有悬而未决的善后处理结果。

尽管事后官方反复强调，往年都会举行的外滩灯光秀，已因安全考虑取消。且这一信息也通过政府网站和当地媒体发布。但仍有如牟滨彬一样未能知晓的外地游客为灯光秀走向外滩。

“一些重要的公共信息，何以在舆论场‘沉没’？”媒体人铁永功追问。

以信息发布与安全机制为起点，在踩踏事件发生后，反思、质疑和追问一直没有停止。

1月5日，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在《中国旅游报》撰文，以《外滩踩踏事件告诉我们什么》的文章批评政府的不作为。这位副局长认为，因为没有组织活动，所在地政府和上级政府责任意识会下意识地放松，但是法律并没有免责。

她引用的论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第七条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。“外滩踩踏事件告诉我们的是，守夜人的责任就是这样。”

直到1月6日，遇难者家属们仍未被告知明确的后续处理结论。“有个戴有‘志愿者’胸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这次（对遇难者家属）是救助，不是赔偿，因为这次活动是群众自发性的。”牟滨彬的伯母讲起来殡仪馆确认遗体时听到的说法，颇为不满。

“我听了很不舒服。”她说，对于这个希望已趋破灭的“失独”家庭而言，“一句救助就打发了？”如何让失去独子的牟滨彬父母，在悲痛过后，在即将到来的老年生活中能过得更好一些？怎么为这个家庭争取到最后一点现实的安慰，对牟滨彬的父母来说，才是更为紧迫的事情。

上接B01版

2009年，深圳彻底让公务员编制的公安消防队伍离开一线，现役制消防队员全面接管灭火工作。

就在深圳消防员职业化受挫几乎放弃的时候，国内多个地方却开始了消防员职业化的探索。

探索发自2003年的衡阳大火，在那场大火中，20名消防官兵不幸牺牲。从那时起，每当有消防员不幸牺牲的事情发生，总会掀起一股呼吁消防“职业化”的舆论浪潮。

2003年，山东招收了4444名合同制专职消防员，这一做法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经验。

2006年2月28日，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提交了“关于推进消防事业改革”的提案，建议建立职业消防体制。当年，公安部召开了“全国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现场会”，要求建立多种形式消防队伍，力推消防队伍职业化。其中，两种主推方式是专职消防队（公务员或事业编）、合同制消防队。

然而，各地的探索并未摆脱“深圳模式”的怪圈。仅过了八年时间，山东合同制专职消防员只剩下2414人，在位率仅46%。

在肖本华的眼里，合同制消防员被定位为“短期临时用工”，实行劳务派遣。但这一工种危险性大、执勤时间长、工资待遇低，导致消防员们“招不来、留不住、战斗力不强”等难题凸显，人员流失现象比较普遍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职业化消防队员，原本应该更加突显出“职业”二字，但是现实中却不如现役制消防队员“好用”。

福建泉州市消防支队的肖逢仁曾透露，当地自2003年招收第一批政府专职消防员以来，安心部队工作钻研业务成为骨干的屈指可数。他们在消防部队的角色，更多是充当消防部队的“临时工”、火场上的“水带工”、生活中的“环卫工”。

职业化最大障碍在经费

“职业化”遇到瓶颈，内地绝大部分消防员仍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。

陈浩（化名）是上海一名合同制消防员，在火场摸爬滚打了七年后，越发地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。他担心将来自己不能再胜任消防员这项高强度的工作后，还能找到什么谋生的出路。

对合同制消防员的军事化管理，陈浩还能适应，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让他觉得，“拿这点钱，没法和国外的职业消防员比，而且在这个高危行业，医疗保障也让人担心，我们不能像现役那样完全报销。”

陈浩的境遇或许代表了目前多数内地合同制消防员的现状。泉州市消防部队基层单位合同员工经费人均每年4.5万元，扣除伙食费、保险费、被服费等，实际到手的工资月均只有1500元左右。

浙江海宁的专职消防队伍待遇在全国算是最好的，但一般队员年实际收入在2万至3万元之间。

在香港，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：“要想生活好，嫁个救火佬”。香港的消防员不仅能养活一家人，还解决了子女的入学和住房问题，而且平时实行轮休制。

而美国消防经费直接由当地政府负责，有部分州政府向居民征收相关消防的税费，每个家庭年均50—200美元不等。美国消防协会2009年统计显示，美国50个州的每年正常消防经费合计约1500亿美元，人均消防支出500美元。

没有经费就意味着没有更好的消防设备、没有更好的消防培训，更何谈专业化、职业化？

2013年12月31日，山东以政府令形式颁发了《山东省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》，对山东省专职消防员队伍建设给予了法律层面的规定。专职消防队伍承担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和火灾预防任务，具有社会公益性，符合条件的消防队将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。特别是专职消防队员，实行劳动合同制，连续订立两次10年的劳动合同以后，将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直至退休。

资深媒体人王志安并不那么乐观，“推行消防职业化的最大障碍在于经费，如果军转民，经费投入估计要大幅上涨。在国内尚且面临消防力量不足的局面下，难！”